

历代“人类记录”的价值及其实现

李 严

(湖南工业大学 图书馆, 湖南 株洲 412008)

摘 要: 历代藏书家和近代、现代图书馆工作者, 通过收集、保存和传递那些记录了人类文明活动的图书, 不断地赋予这些“人类记录”以新的意义和现实价值, 其主要从历史文化的的新生、历史精神的发扬、历史经验的拓展和历代记录的繁衍等四个方面展开。为保存和传递“人类纪录”的历代藏书家和图书馆人功不可没, 现代图书馆馆员应努力创造条件, 使图书馆馆藏的历代人类纪录实现其现实价值, 并让历史“纪录”与新时代的“纪录”交相辉映。

关 键 词: 人类记录; 图书; 历史文化; 现实价值

中图分类号: G25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09)01-0102-04

On the Value of Human Records in the Past Dynasties

Li Yan

(Library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8,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mainly expatiated on human record from four main headings as rebirth of history and cultur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spirit, enlargement of history experience and the multiplying records in the Past Dynasties. The bibliophiles and librarians had been devoted to collecting and preserving human records in the past dynasties. Moreover, the librarians in modern times should try their best to realize the real value of human records which kept in libraries, and make th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new-era records boost to each other.

Keywords: human record; books; historical; realistic value

在中国漫长的图书馆(包括藏书楼)发展史上, 保存和流传下来浩若烟海的图书, 分别记录了各个时代人类的文明活动, 这些“记录”在流传中, 不断产生新的意义和现实价值。基于此, 众多的图书馆学学者把保存和传递“人类的记录”视为图书馆的核心价值内容。历代人类记录涉及到各个领域, 笔者拟从历史文化的的新生、历史精神的发扬、历史经验的拓展和历代记录的繁衍等四个方面予以阐述。

一、历史文化在传递中新生

图书记录了历史文化, 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就是通过藏书的流传才得以生生不息、一脉相承的。图书流传越广, 能够阅读这些图书的人就越多。“现在的读者阅读过去的书, 书在阅读的过程中就变成新的了。每一个读者都使某一本书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不朽。在这个意义上, 阅读就是使书籍复生的仪式”^[1]。使

“过去的书”得以“复生”, 就是使历史文化获得新生。“复生”历史文化的关键在于, 通过认真阅读蕴含这些文化的图书, 找准“过去”与“现在”的联系点。以《论语》为例, 《论语》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孔子的言行所做的记录。直到今天, 《论语》仍有很强的生命力。2006年, 于丹更是通过《百家讲坛》对《论语》进行现代解读, 在全国掀起一股新的阅读《论语》的热潮。现在, “《论语》已经真正联系到‘和谐社会’和奥林匹克的世界了”^[2]。《论语》中, 有五句名言, 即“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德不孤, 必有邻”、“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礼之用, 和为贵”, 正式成为了北京奥运会的口号。于是, “……《论语》迎来了大复活的新春”(孔健:《中国出现‘于丹现象’的背景》)^[2]。其实,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文化, 通过《论语》的流传, 不仅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 而且还影响到世界很多国家。“在当今重读儒家经典, 建设和谐文化, 创造和谐世界之际, 孔子逐渐成了全世界文化的焦点, 儒学成为热门话题, 并出现了‘孔子热’、‘儒学热’、‘国学

收稿日期: 2008-01-04

作者简介: 李 严(1965-), 女, 湖北汉阳人, 副教授, 主要从事图书馆管理及研究工作。

热”^[2]。这一些都证明了,“《论语》是‘千古永远’超越时代永远发挥作用的书籍”^[2]。

二、历史精神在流传中发扬

人类在从事文明活动中,不仅创造了赖以生存的物质财富,而且也铸造了赖以发展的精神支柱。而这些精神支柱也就是世界各国各自的民族精神。我们的祖先在历史的长河中,凝聚了宝贵的中华民族精神。这种精神记载在中华民族的经典古籍上,而这些经典又通过藏书家和图书馆人之手,让人们受到这种精神的熏陶和感染,并使其不断发扬光大。正如德国学者卡尔斯泰所说:“图书是客观精神的载体,图书馆则使客观精神得以传递。”下面以与图书结下了不解之缘的古今藏书家所具有的精神为例,进行简要的说明。

(1) 爱国爱民的精神。从流传至今的图书文献资料,可以了解到,中国古代藏书家绝大多数都很爱国。他们无论是职位高低、家境贫富,都会以安邦治国为己任。在国家尚无战乱时,他们常常与藏书为伴,或苦读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或总结历史兴亡事迹,为振兴国家献计献策。前者如唐代杜牧,他从少年开始,就阅读了祖父杜佑所留下的大量藏书,钻研了杜佑撰写的《通典》,从而了解“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由此可以看出,他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要为强国兴邦大显身手。后者如北宋苏轼,他初登官场就写了大量策论,陈请朝廷采取措施,扭转国家的贫弱局面。如他在《教战守策》中,“针对北宋苟安之习,指出‘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的危险,主张平时教民习武,随时备战,以御外患,并提出了具体办法”^[3]。在国难当头、山河破碎的时候,他们主战拒降,以身报国。

在爱民方面,他们也多有表现。他们在任时,就努力为民造福。正如唐代白居易所说:“达则兼济天下”(《与元九书》)。而白居易本人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他任杭州刺史上,主持兴建西湖水利。宋代苏轼任杭州太守时,也组织人力疏浚西湖,并把挖湖的泥土堆成一道长堤。如今,因白居易而得名的“白堤”与苏轼留下的“苏堤”,已成为西湖的重要景点。而这两座堤也成为人们纪念白氏、苏氏造福于民的不朽丰碑。藏书家爱民之情还更多地表现在他们大量的诗文之中。如白居易,在离开杭州时,写了《别州民》一诗深情地向杭州人民告别。他在诗中写道:“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2) 拒奢尚俭的精神。一生与书为伴的藏书家,从阅读中感受到一种高雅的情趣和无穷的乐趣。所以,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把物质享受看得很淡。富有者拒奢尚俭,他们省下钱来尽量多买书、多藏书;贫困者安贫乐道,他们为了买书节衣缩食,甚至不惜典衣物、卖家产。前者如南宋尤袤,明代叶盛、赵琦美等。尤袤多年身居高位,后官至礼部尚书兼侍读,但生活俭朴。公退回家,就一心读书、抄书。他曾对友人说:“吾所抄书今若干卷,将汇而目之。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琴瑟也。”(《遂初堂书目序》)。尤袤的“四当”论成了此后藏书家淡泊明志、以读书为乐的处世格言。叶盛曾任山西参政、两广巡抚、吏部左侍郎等职。然而,他“身虽以贵,萧然犹寒士”(吴宽:《叶文庄公祠》)。赵琦美的父亲赵用贤曾官至吏部侍郎,赵琦美少时即为贵公子。后来自己又任刑部侍郎。但他坚持“布衣恶食,无绮纨膏粱之色”^[4]。后者如宋代许棐、明代李如一、徐文等。许棐身处贫困之境却丝毫不以为苦,也没有动摇他“喜书”,从而藏书的决心。通过多年努力,他实现了“环室皆书”的理想。他认为自己能够做到“少安于贫、壮乐于贫、老忘于贫”,“乃书之赐也”(《梅屋书目·自序》)。李如一为了购书,宁愿典物卖田。徐文声称,“可无衣、可无食、不可无书”^[5]。为了购书,他节衣缩食。有一次甚至把准备买药治病的钱用来买了《丁鹤年诗》。

(3) 藏以致用的精神。无庸讳言,藏书家中是有些思想封闭、保守的人,他们重藏轻用,甚至只藏不用。但是,确实还有不少思想开明的藏书家能够藏以致用。他们藏以致用分自己用、给他人用、留给后人用三种情况。自己用,主要是用于治学。如南朝著名学者陆澄,“行坐眠食,手不释卷,时人称其为‘硕学’”(《南齐书》本传)。尤袤为编写《遂初堂书目》,“读书勤奋至于‘唇焦’,抄书刻苦至于‘脱腕’”^[4]。黄宗羲是明清之际著名的藏书家,又是明末清初集大成的学术宗师。“他平生嗜书如命,且勤于写作,著作极为丰富”^[5]。而有些藏书家,在藏书思想上能够突破自己所处时代的局限,能主动、热情地将自己的藏书提供他人使用。如三国时的向朗常常“开门接客,诱纳后进”(《三国志》本传),首开将私藏图书对外公开的先例。晋代范蔚,家藏图书七千余卷,他将自己的藏书全部向四方游学之士公开,“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晋书》本传)。明代李如一乐于借书于人,他说:“天下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读之”^[5]。另外,

如何将藏书一直保存和流传下来,从而能够为后人所用,也是藏书家考虑很多、采取行动也很多的事。而他们在这些方面的行动可以归纳为爱惜图书、保护图书和刻印图书等。

(4) 爱书护书的精神。一些藏书家表现出来的爱书护书精神也是十分突出的。他们自己先做爱书表率,如宋代司马光就是一个爱书典型。他读书时,“几案必洁净,翻阅务轻柔,捧读必填衬方板以防手汗污渍,揉伤纸张”,所以,他“所读之书,终身如新”^[4]。他们还教育子孙和亲属爱书。北齐颜之推叮嘱儿孙:“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颜氏家训》)为保护图书,藏书家十分注意防火、防潮、防霉。考虑到图书随时可能遭受意外而导致散失、损毁,不少人还制定和实行了“复本制”。如唐代陆龟蒙“癖好藏书,本皆有复”(《甫里集》)。而实行复本制最为周到的要算白居易。白居易将诗文结集后,坚持一式五本,分五处收藏。尽管经历了无数次兵荒马乱,由于白氏的措施得力,他的诗文集仍能够较完整地保存和流传下来。尤其可贵的是,当图书面临毁灭性灾难时,就有人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图书。清代人丁丙、丁申弟兄二人,在战乱中,从正在被烧毁的文澜阁抢救出《四库全书》。他们这种舍身护书的精神,不仅受到时人赞扬,光绪帝也下旨表彰其行动“洵足嘉惠书林”^[6]。

(5) 热心公益事业的精神。在近代藏书家中,有些杰出人士以开创近代教育和创建新型藏书楼为己任。在办近代教育方面,严修堪称表率。他在为政期间,就办过各类学校多所。正式退出仕途后,他一心致力于一系列“南开”学校的缔造,先后创建了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等。在严氏的鼎力扶持下,南开大学成为华北著名学府,当时在校生就达数千人之多。在创建新型藏书楼方面,徐树兰具有代表性。他于1900年至1903年创建了古越藏书楼,配备了图书管理人员和日常行政管理人员,除传统节日外,一律对外开放。在设备上,除藏书室外,还设有专门的阅览室。在楼藏种类上,不仅有中国古代典籍,而且还有时务、实业新书和外国文献。由此可以看出,古越藏书楼是一座由私人创办的公用藏书楼,已具有图书馆的雏形。

(6) 承先启后的精神。现代知识分子既是流传下来的图书的阅读者,又是图书所传递的历史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就拿爱国来说,“中国知识分子(笔者注:包括藏书家和图书馆人)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

传统,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望其项背的”^[7]。而继承这一传统的现代藏书家和图书馆人,“爱国主义在他们心灵深处已经生了根,什么力量也拔不掉的。甚至泰山崩于前,迅雷震于顶,他们会依然热爱我们这伟大的祖国”^[7]。郑振铎正是这样的现代爱国藏书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写下了大量宣传和鼓舞人民大众抗敌的诗歌。除此之外,郑振铎作为一名藏书家,其爱国行为大都与“书”有关。一方面出版爱国进步革命的书籍,另一方面为祖国收存和保护了相当数量的典籍。再如北大“藏书状元”季羨林,作为郑振铎的学生,肩负起一位现代藏书家承先启后的历史使命。一方面,他是历代藏书家围绕着“爱书”所具备的可贵精神的集大成者。他有一颗博大的爱心,他爱祖国、爱人民、爱学生。他曾说过:“即使把我烧成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7]。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传承和弘扬博大精深的人文传统的大学者。他爱读书、会写书。今天,年逾九旬的季羨林已经是学界泰斗,其研究涉及国学、东方学、印度学、语言学、文化学、民族学、佛教学、敦煌学等多个领域,并被公认为这些领域的大师。

三、历史经验在新实践中拓展

人类在从事各项文明活动中,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而这些经验由那个时代的学者、专家进行总结提高,并记录在以纸张为主的载体上。当人们读到这些记录的同时,也就了解乃至学到其中的经验,并将这些经验付诸新的实践,从而使原记录的经验得以延伸与拓展,进一步产生出新的经验和有关新经验的新记录。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经验种类繁多,但都可以归纳到社会活动经验和自然科学活动经验两大类之中。

(1) 社会活动经验。中国历代藏书,对我们的祖先社会活动经验,多有记述。如孔子所总结的因材施教、启发式等教学经验和原则,一直为千千万万个教师所运用,并形成了与时俱进的新的教学经验。在历代的教育活动中,先人还创造出一种独具民族特色的教育形式——“家训”。所谓“家训”就是以书写家信等方式对子女和亲属进行教育。其中,较为著名的“家训”有颜之推所著的《颜氏家训》、朱柏庐所著的《朱子家训》,以及曾国藩的《家书家训》等。有人评价《颜氏家训》“篇篇药石,言言龟鉴”(王钺:《读书丛残》)。而《曾国藩家书家训》则反映了曾国藩很重视家庭教育和营造优良的家风。正是这一优良家风的熏陶,“使曾氏一门代有人出。……据调查,曾国藩及其四兄弟

家族,绵延至今两百年间,共出有成就的人才二百四十余人”^[8]。正由于以上“家训”浓缩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教育子女等成功的经验,对后人有多启迪和借鉴作用,所以现在每一个图书馆和不少家庭都收藏了“家训”这一类图书。

(2) 自然科学活动经验。相对于对社会活动经验的记载,中国的古代典籍对自然科学活动经验的记载不是太多,所以这些纪录更显得难能可贵。如北宋的毕昇,在印刷生产中发明了活字版印刷术。但是,这一发明开始并未引起时人的重视。直到沈括撰写《梦溪笔谈》时,才在该书中“详细记载了宋代毕昇泥活字的制作过程,这是宋代文献中仅有的一篇关于活字印刷的记载”^[4]。泥活字印刷术正是凭借《梦溪笔谈》的记载才流传下来。到了元朝,王祯利用泥活字原理,发明和改进了木活字。他所著的《造活字印书法》(附载其撰写的《农书》之末),“是最早系统地叙述活字版印刷术的文献”(《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从该书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此时已有了锡合字。“锡制的印刷活字,为世界最早的金属合字”(同上)。自然,《造活字印书法》则是世界上最早记载金属活字的书。锡合字的出现,启发人们围绕金属做文章。于是,又陆续出现了铜活字、铅活字等。“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国一项名耀于世的贡献”(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而为“活字印刷术”的普及和推广,发挥了重大作用的“纪录”,当属《梦溪笔谈》与《造活字印书法》。

四、历代纪录在传承中繁衍

历代人类活动的纪录,在传承过程中会繁衍很多新的纪录。这些纪录可分为三种情况:

(1) 综合利用历史纪录,撰写新的著作。如各个领域的学者专家,都需要把自己或有关机构所收藏的图书作为参考资料,西汉的司马迁就是靠“金匱石室”的皇家藏书,才得以完成《史记》的。鲁迅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明代的李时珍在医药实践的基础上,参考了历代有关书籍 800 余种,费时 27 载。终于完成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郭沫若赞《本草纲目》为“医中之圣,集中国药学之大成。”^[9]

(2) 利用原著所载人物、事件或故事、传说作为文学戏曲创作的素材。如长篇历史小说、历史题材、戏曲和影视剧本、历史名人传记,都离不开流传下来的有关原著。如京剧《将相和》就是源出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再如《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就

为后世戏曲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3) 对原著进行注释、解读。“过去已有的纪录要加以消化、摘录,随着阅读与注解的不断发展,新的书籍和注解不断诞生出来”^[1]。为了普及原著,一些对该著作有专门研究的学者,通常围绕着原著撰写注释和解读文字,一部经典著作,常会拥有若干注释本和解读本。如《论语》,古时就有三国魏何晏的《论语集解》、南朝梁皇侃的《论语义疏》、宋邢昺的《论语正义》、朱熹的《论语集注》、清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等。至于今人对《论语》的新的注解本、导读本,更是数不胜数。仅仅是于丹的《〈论语〉心得》一书就发行了数百万册以上。

上述四点,虽然无法全部概括“人类纪录”的现实价值,但是,却可以证明,“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宝库”,“中国古代光辉灿烂的文化有极大一部分是通过书籍流传下来的”^[7]。也就是说,“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绳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余秋雨:《风雨天一阁》)^[6]毫无疑问,历代为保存和传递“人类纪录”(图书文献资料)的藏书家和图书馆人功不可没。而作为现代图书馆馆员,更要努力创造条件,使图书馆馆藏的历代人类纪录实现其现实价值,并让历史“纪录”与新时代的“纪录”交相辉映。

参考文献:

- [1] 阿尔贝托·曼古埃尔. 夜晚的书斋[M]. 杨传纬,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4, 24.
- [2] 于丹,孔健. 论语力[M].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 7, 5, 129, 8.
- [3] 郭预衡. 中国历代散文精品(下)[M].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 297.
- [4] 任继愈. 中国藏书楼[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1065, 812, 23, 162, 229.
- [5] 杜产明,朱亚夫. 中国名人书斋大观[M]. 上海:上海大辞典出版社,1997: 81, 93-94, 75-76.
- [6] 钟敬文,张岱年,邓九平. 书斋雅乐[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112-113, 335.
- [7] 季羨林. 我和书[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 197, 198, 187.
- [8] 傅军龙. 晚清文化地图——1840至1911年的中国文化人[M].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 83.
- [9] 周啸天. 中国名人快读[M].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6: 333.

责任编辑:曾凡盛